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

兰寿春 编注

张佑周 主编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佑周 主编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

兰寿春 编注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辑注 / 兰寿春编注 -- 成都 :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1.7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 / 张佑周主编)

ISBN 978-7-5409-4827-6

I. ①闽… II. ①兰…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作品综合集—福建省 IV. ①I21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1925号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辑注

作 者：兰寿春

封面设计：林满华

责任编辑：邹景阳

出版发行：四川民族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龙岩东方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30.5千字

印 张：34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书 号：ISBN 978-7-5409-4827-6

定 价：30.00元

本丛书为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
建设重点项目“客家文化与闽台客
家关系研究”成果之一

总序

李金莲

2010年2月13日,农历己丑年除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上杭古田五龙村和永定客家土楼视察,与当地客家民众共度除夕。在五龙村,胡锦涛总书记饶有兴趣地为客家龙“点睛”,并与客家乡亲一起跳起欢快的客家民间歌舞“年年好,节节高”。而在永定土楼,胡锦涛总书记则深情地嘱咐土楼客家人说:“客家土楼是中华文化瑰宝,是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的典范,希望一定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总书记的视察和关怀给闽西客家乡亲以极大的鼓舞,总书记的讲话言简意赅,独到精辟,高屋建瓴,概括了客家土楼的文化内涵——“大家庭、小社会和谐相处”,明确地指示我们要将客家文化“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作为闽西客家祖地唯一本科院校龙岩学院的学者,贯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闽西是客家祖地,是中华汉民族的独特民系——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域。一千多年前,由于战乱或自然灾害等原因,中原汉人一波又一波南迁,特别是唐末至两宋期间,许多南迁汉人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这片背靠中原、面向大海的特殊地域,在这一片相对封闭的特殊地域以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发、耕耘,并以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融合并同化当地百越族土著,终于“反客为主”,客家民系于是在这一片地域形成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得到充分的发展。

作为伴随客家民系的形成而形成的客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祖辈辈的客家人历经千年精心培育已经茁壮成长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在现代化进程急速推进的今天,这棵大树仍然发挥着应有而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

需要我们继续精心呵护,才不至于叶黄枝败,才能继续保持郁郁葱葱。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校(其前身是龙岩师专)学者就敏锐地发现,客家文化是本地颇具特色的文化,是我们这类院校的社科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他们率先闯入这块在祖国大陆尚无人涉足的研究领域。他们从对颇具争议的现代著名侨领、成功的华侨工商企业家、本地区客家籍人士胡文虎的研究开始,并专门成立大陆高校第一个客家人研究的学术机构——龙岩师专胡文虎研究室,将研究成果结集发表在《龙岩师专学报·增刊〈胡文虎研究〉》上,以大量的事实推倒了一个时期以来强加在胡文虎先生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后来给胡文虎先生公正评价、恢复其爱国侨领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88 年 6 月,我校成立大陆高校首个客家研究机构——龙岩师专客家学研究室(后改名“客家学研究所”),1989 年 11 月该所研究人员编辑出版《客家史与客家人研究》第一辑,送往当年 12 月中旬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的世界客属联谊大会,赠送给与会客属同胞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引起巨大反响。新加坡《联合晚报》、香港《文汇报》、台湾《联合报》和北京《光明日报》等海内外媒体,纷纷对该刊及联谊会增加客家学研究这一全新内容进行报道,注意到“大陆兴起客家学研究”、“中国开展客家学研究”。这个不小的波澜,正是由我校学者的研究成果掀起的。其后,该刊更名为《客家学研究》,仍由我校学者参与编辑,并且编辑室设在我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正式出版,影响更大。1991 年 6 月,由我校学者李逢蕊主编的《客家纵横》杂志创刊,为我校及海内外客家学研究者开辟出一块新的园地。

我校学者在客家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由我校学者参与发起及承办的“闽西客家学研讨会”(1991 年 9 月)和“首届客家方言学术讨论会”(1993 年 9 月)相继在龙岩举行更是进一步推动了闽西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校学者还先后参加“上海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1 年 10 月)、“香港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1992 年 9 月)及其后历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暨国际客家学研讨会。

2000 年 10 月,我校客家学研究所更名为“客家文化研究所”,学校将其作为人文学科重点研究所列入建设规划,并将客家文化研究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课程列入文科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我校客家学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先后正式出版张佑周、陈弦章、徐维群编撰的教材《客家文化概论》(2002 年 5 月)和张佑周的《客家祖地——闽西》(2005 年 10 月)、林清书的《武方言研究》(2004 年 8 月)等专著。

2007年1月,我校申报的以客家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民俗学”获省教育厅批准立项为“福建省新建本科高等学校重点学科”。2008年1月,我校以“客家文化研究所”为基础申报的“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培育)——龙岩学院客家学研究中心”获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建设。2008年8月,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申报的福建省服务海西建设重点项目“客家文化与闽台客家关系研究”获省教育厅、财政厅批准立项。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参与策划并承办由国台办《两岸关系》杂志社和龙岩市委、市政府等单位主办的“客家文化与两岸和平发展”研讨会(2008年11月),参与协办由龙岩市人民政府和台湾中华海峡两岸文经交流协会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2010年6月)。同时还参与闽西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工作,为龙岩市委、市政府打造“客家祖地”、“海峡客家”文化品牌提供相关材料和相关建议,为龙岩市博物馆撰写“海峡客家”展区布展方案,为有关县、乡镇客家文化品牌建设提供咨询意见等等,为地方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著名客家学研究专家、我校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张佑周教授主编的这套“闽西客家研究丛书”是我校客家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是我校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春节期间视察福建、视察龙岩时的重要讲话,配合龙岩市先行先试,打造“海峡客家”文化品牌,推进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一个实际行动。

“闽西客家研究丛书”包括《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客家之子论客家》、《海峡客家论集》、《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等四部专著或文集。

张佑周先生撰写的《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研究》通过大量客家文化事象透视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探讨现代化进程对于闽西客家传统社会的冲击以及如何“守护好、传承好、运用好”“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的问题。

《客家之子论客家》收录丛书主编张佑周近20年发表的客家学研究论文30篇,其中包括对于客家源流、民情习俗、民间信仰、语言文学、文化事象等诸多方面的探讨,观点独到,不乏一家之言。

《海峡客家论集》收入本校客家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吴福文先生和张树廷先生近年来有关海峡两岸客家研究论文凡31篇。作者通过对闽台两地客家文化、人物特别是以往人们较少涉及的客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台湾政治生态中的客家因素等的研究,探析海峡两岸客家的渊源关系以及客家文化研究交流对于两岸和平发展的积极意义。

《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作品辑注》是我校客家学研究新秀兰寿春副教授关于客家文学作品研究的尝试之作,辑录自唐代至清末包括闽西客家籍作者以及在闽西为官作宦或流寓闽西的非客家籍作者有关人文、山水、民情习俗的作品,也有少数非客家籍作者涉及闽西的作品,还有部分闽西客家民间文学作品。体裁以诗歌、散文为主。尽管辑录者对所有评释都着墨不多,但观点独到,语言精炼,足见其扎实的古典文学研究之功力。

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将福建省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成“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和“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将福建省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和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的内涵,不仅对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海峡东岸——宝岛台湾的发展以及对于海峡两岸的交流合作与和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看来,我校学者此前及今后所进行的客家文化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张佑周教授送来丛书书稿嘱我作序。身为客家女,我欣然命笔。谨对我校客家学研究写下一五回顾性文字,并表达本人对客家文化研究重要意义的粗浅看法,就教于海内外客家研究专家。

（作者系中共龙岩学院委员会书记、研究员）

序

近几年来,客家学的研究方兴未艾。随着客家学研究的深入,作为客家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文学,也逐渐受到重视。关于客家文学的研究,我想必然会涉及几个问题。

一是何谓客家文学,及客家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系统是否可以成立。这涉及对客家文学的界定。自罗香林《客家学导论》出后,客家这一概念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作为客家文学这一概念,它该如何界定,这是不能不考虑的。比如,把凡是客家人所做的文学作品都定位为客家文学;或是把客家地区出现的文学作品定位为客家文学。就前者来说,作者是否为客家人,其身份要确认。那么,流寓在外的客人的作品可否归入?就后者来说,客家人在客家地区创作的作品没问题,但非客家人仕宦或流寓客家地区的作品算不算?

二是客家文学形成的起始时期和分期如何确定。客家文学的发展演变是否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变迁有关系。客家民系的形成,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或是起始于东晋,或是起始于唐五代,或是开始于南宋。不管是在哪个时期,都已是中国古代文学成熟的时期了。就此来说,客家文学的产生,其起点应该是比较高的。从兰寿春君所辑作品开篇的唐宋人作品,可以说明这一点。起始期如果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同步,那么其分期是否可以不按照一般文学史的分期那样以朝代的变迁来分,而以客家民系变迁的几个大的时期来分呢?

三是客家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研究客家文学,还要考虑到它与中国文学主流的关系,与地域文学的关系。兰寿春君所辑的客家文学作品,就体现了鲜明的闽西地区的区域特点。

兰寿春君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即从客家文学作品的结集、辑注入手,尽可能的把客家文学作品收集起来,再由此进行客家文学的研究,最后写一部客家文学史。他从客家人聚居的闽西地区入手,编辑客家文学作品,以期再扩大到其他地区,这样的

路径是对的。闽西地区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区,自唐宋以来出现了不少的文学作品。及至近代,作品就更多了。兰寿春君曾花了很大的时间精力对客家作品进行搜集,此书是对闽西地区客家文学作品的第一次集中展示,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尽管有的作品的人选与否还可商榷,但有利于读者对客家文学的了解。兰寿春君还对作品进行了简洁且认真的注释,可供读者参考。这些,对于客家文学的研究,都是有价值的。当然,对于客家文学的界定、分期,以及作品的搜集,还有许多要做的工作。寿春君仍在不懈的努力之中。

祝寿春君在客家文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谨为序。

郭丹

2010 年仲秋

绪言：客家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以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为例

关于客家文学的界定，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困扰客家文学研究的难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产生了以台湾的罗肇锦先生、黄恒秋先生、广西的卢斯飞先生为代表的“从宽”说，以湖北的古远清先生、广东的胡希张先生为代表的“从严”说这两类主导观点，二十一世纪初又诞生了以广东的罗可群先生、江西的钟俊昆先生为代表的客家文学新命题。然而，这个看似简单却又是最根本的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明确的解说，分歧与误解依然存在。笔者认为，要解决客家文学的界定问题，应当重新审视客家文学发展的历史，回归客家文学的实际，把最基础的东西——客家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辨析清楚，才能给予客家文学准确的界定。

一、“客家文学”界定的现状与现状的尴尬

早在 1992 年 11 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客家文化历史国际研讨会上，客家学者就对客家文学的界定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产生了种种不同的意见。此后经过几次会议的研讨，在九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从宽”说和“从严”说两大主流观点。

“从宽”说的代表罗肇锦先生在 1993 年发表的《何谓客家文学？》中提出：

“一个客家人，用客家话写作（当然也是客家话思维），所写的内涵，整个着眼与客家社会文化感情有关，那么他写的作品就是道地的‘客家文学’了。其次，一个客家人。自然表达的语文形式是‘国语’，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是以客家话来思考，所写的又都与客家事物有关，这类作品也应归入客家文学。”⁽¹⁾

这个观点没有对语言的运用提出限制（客家话、“国语”均可），只对作者限定在“客家人”。于是黄恒秋先生在《台湾客家文学的省思》中就把作者的身份扩大为

(1) 黄恒秋编：《客家台湾文学论》，第 8 页，台湾苗栗县立文化中心，1993 版。

“任何人种或族群，只要拥有‘客家观点’或操作‘客家语言’写作，均能成为客家文学。”^[1]

同是“从宽”说的卢斯飞先生在《客家文学研究刍议》一文中还特别强调：

“对客家文学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这是因为：划分得太严太细，……也就不可能到丰富的资料海洋中去翻滚梳爬，自然也就难以探索到客家文学的创作特色和客家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2]

客家文学的界定，主要涉及四个因素：作者身份、题材因素、语言因素和区域因素。上述“从宽”说抓住题材因素（客家事物、客家观点）这个实质内容，而对作者和语言的要求予以了宽泛。

“从严”说则对作者的创作题材和语言运用进行严格要求。古远清先生认为：

“客籍作家写出的作品是否一定是客家文学呢？这也不一定。”“更多的客籍作家不写客家生活，但有时用某些客家生活素材创作文学作品。如著名象征派诗人李金发，他的一首颇有名气的作品《弃妇》，据说就是以作者故乡梅县一位叫刘义妹的女人为模特儿写成的。但《弃妇》没有一点客家风味，而有的是浓郁的法国风味。故客籍作家取材于某些客家生活的作品，也不一定是客家文学。”^[3]

胡希张先生对语言的运用要求更严：

“何谓‘客家文学’，说白了，就是客家方言小说”，客家文学“不是就题材而言，而是就作品的形式、风格，主要是语言风格而言”。^[4]

在客家文学概念的诞生之初，百家争鸣式的论争有利于学术的研究与发展。但是对客家文学界定“从宽”“从严”的矛盾如何协调与操作，还需要在脚踏实地的研究与实践中找到答案。

到2000年和2006年底，客家文学研究诞生了两项新成果，一是罗可群先生的《广东客家文学史》，一是钟俊昆先生的《客家文学史纲》。两部著作中对客家文学的定义和内涵做出了新的表述，可以说，这是客家文学界定论争的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阶段性成果。

之所以说是“阶段性”成果，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仍然不能形成一致，而且还显露

[1] 黄恒秋编：《客家台湾文学论》，第16页，台湾苗栗县立文化中心，1993版。

[2] 卢斯飞：《客家文学研究刍议》，载《客家文化历史纵横谈》，第189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版。

[3] 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载《客家研究》辑刊，1994年第2期。

[4] 胡希张：《罗嗦一个“老话题”》，载《梅州日报》，1997年8月23日。

出一些新问题。比如罗可群先生在提出客家文学的定义之后,阐述了客家文学应包含的三方面内涵,其中就有两个方面的问题没有说清楚:一是客家文学所用的语言,除了“用客家人的生活语言——客方言”,还能用什么语言?“不论采用何种方式方法”的意思是什么?二是客家文学的作者身份,只能是客籍作者,还是包括非客籍作者?书中虽有点到“非客籍作家若能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谭元亨的《客家魂》,也应归入客家文学的范畴。”^[1]但是语焉不详,尤其“若能”二字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曾令存先生在《客家文学的发生》一文中就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说:从该书把张九龄、韩愈、苏轼、杨万里、汤显祖等“人粤作家”纳入客家文学历史论说的视野,以及书中涉及的眼花缭乱的客家文学作家作品看,笔者不免要质疑:这些“非客籍作家”被纳入客家文学视野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其“深入客家地区”,创作出了反映客家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深入”在这里是个什么概念?“客家人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内涵?^[2]

钟俊昆先生也是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于是在自己的书中提出:“凡是历代客人的创作,非客籍作家在客家地区(寓居客家)的创作或写作客家地区的作品均应纳入客家文学的考察、研究、评判范围,也都是客家文学的组成部分。”^[3]

这个解说显然是扩大了客家文学创作主体的外延,观点更加鲜明。但他强调“凡是”一词失之宽泛,会造成只要是客家人创作的,不管内容和风格是否与客家有关都算客家文学的结果。而且“非客籍作家在客家地区(寓居客家)的创作”也不一定就是客家文学,除非他们的作品内容与客家地区的人、事、物有关。

很显然,造成上述问题和疑问的原因,就是对客家文学内涵与外延的不明确。下面就以闽西客家古代文学为例,逐一辨析客家文学的作者身份、题材内容、语言形式和本质特征。这些基本的因素明朗了,客家文学的界定也就清晰了。

二、客家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历史上的福建客家主要分布在闽西的汀州八县,包括今天龙岩市所辖的长汀县、连城县、上杭县、武平县、永定县,以及三明市所辖的宁化县、清流县和明溪县,这些都是纯客家县。周边的沙县、将乐、南靖、平和、诏安等十几个非纯客家县也有许多客家人。在这片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群山之中,曾经涌现了许多卓越的客家儿女,

[1] 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第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版。

[2] 曾令存:《客家文学的发生》,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6期,第120页。

[3] 钟俊昆:《客家文学史纲》,第2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版。

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也产生了优秀的客家文学。

从唐宋以至明清的一千多年间,是闽西客家文学从萌芽到生长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从目前已知的史志资料看,较早辑录客家文学作品的是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胡太初修、赵与沐纂的《临汀志》,其后则是明代黄仲昭修纂的《八闽通志》。清代乾隆年间曾曰瑛修、李敏纂的《汀州府志》保存了较多汀州八县的诗文与著述名录,其中“文苑”部分辑录了宋代和明清著述名录105家202部著作,文苑人物传37家;在“艺文”部分又辑录了历代诗歌198首(题)、赋9篇、各体散文192篇。道光年间史学家杨澜编辑的《汀南集存》四卷保存了汀州各县五代以迄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诗赋,尤其难得的是,此书还有对作者、作品的精要注释与点评。收集一县一地作家作品较多的主要有清代版和民国版的各县县志,数量最多的要数丘复所编《杭川新风雅集》三十卷,他采集明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上杭籍诗人就有459家,诗歌6135首。

从这些历史沉淀的闽西客家古代文学材料出发,我们可以从作者、题材和语言三个方面,分别来考察客家文学的内涵和外延:

(一)从作者身份来看,客家文学的作者是由客籍作者和客寓作者两类构成。

所谓客籍作者,是指属于客家人身份的作者;所谓客寓作者,是指暂时寓居客家地区的非客籍作者,主要是指前来客家地区仕宦的官员,或流寓的诗人。前者是客家文学创作的主体,后者是客家文学创作的附翼。严格地说,在客家文学发展进程中,主体与附翼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它们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关系。唐五代和宋元时期,由于闽西地处山区,文化相对落后,客籍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很少,还是处于孕育与萌芽状态,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前来汀州各县仕宦的官员,或流寓的诗人。这些客寓作家的创作,对客家文学的产生起着催生和引领的作用。这种文学现象与客家民系形成于唐宋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民系的形成,不单是地域的因素,更是文化的因素;只有在客家文化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客家文学的大发展与繁荣才有可能到来。这些客寓诗人,他们仕宦、生活在客家地区,同样是客家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和建设者,他们的诗文描写客家地区的山水民情、抒写在客家地区的生活情感,认同客家的文化习俗,他们的创作理应属于客家文学的范畴。例如,中唐时期的著名文人元自虚、韩晔、蒋防曾任汀州刺史,唐末诗人韩偓曾流寓汀州;北宋元丰年间,临汀郡守陈軒与通判郭祥正、福建转运判官蒋之奇等人同游汀郡山

水,他们都写下了许多精美的诗歌。如陈轩所作《汀州》^[1]二首:

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

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

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

花继腊梅长不歇,鸟啼春谷半无名。

此诗咏汀州的开创、百姓的安宁与环境的优美,字里行间洋溢着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恍如世外桃源的喜悦,历来脍炙人口。北宋末年,著名诗人韦骧、曾肇、洪刍也在汀州留下了诗歌的足迹。南宋著名理学家、诗人朱熹曾应长汀县主簿刘子翔之邀,来汀州东山书院讲学;泰宁进士邹应龙也曾游历长汀,作诗《珠峰映翠》、《登谢公楼》。尤其幸运的是,宋代两位著名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李纲、文天祥都来过汀州,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他们在福建的活动和创作,对爱国思想的传播,对诗歌创作的推动,作用都是巨大的。”^[2]

据《八闽通志》和《临汀志·进士题名》记载,宋代临汀郡考中进士的有 59 人,另有特奏题名 100 人,说明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宋代,客家文化的起点还是不错的。但是,并非中进士者必然就是诗人,诗人也无须一定要中进士。我们今天所能认定的客籍作家,只能是凭借史志典籍中记载有诗文或诗文集传世的作者进行考量。唐宋时期的闽西客籍诗人主要有梁藻、郑文宝、邓春卿、王宗哲、邓肃、罗从彦、杨方等人。例如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宁化县人,太平兴国八年(983 年)进士,累官至工部侍郎,文章干略俱优,其诗深得当时晏殊、欧阳修等著名诗家赞赏^[3],有《郑文宝集》三十卷、《谈苑》二十卷等。清代史学家杨澜在《江南廉存集·自序》中说:“汀有诗人,自宋郑仲贤始。”^[4]又如理学诗人杨方(1135—1212),字子直,号淡轩,长汀县人,隆兴元年(1163 年)进士。杨方慕朱熹理学,中进士后即专程拜谒于崇安,面受所传,成为朱熹的高徒。杨方的创作以议理散文为主,如他的《原心》篇;诗歌也有

[1] (明)解缙等编:《永乐大典》,第 7895 卷。诗题一作《咏汀州》。

[2]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第 127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3] (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进士题名》,第 147—148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4] (清)杨澜:《江南廉存集》,同治癸酉(1873 年)版本。

不少,其《送长汀簿张振古解印归》二首,见于《临汀志·名宦》,也见于《汀南廩存集》。在这些客籍优秀诗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客家地区迎来了文学的春天。

明代开始,由于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客籍作者迅速增加,成为客家文学创作的主体。笔者据各种客家地区的史志统计,知名的客籍作者由唐宋元时的14人,增加到明代的65人、清代91人以上。其中不乏像郝凤升、李世熊、黎士弘、丘嘉穗、刘坊、上官周、华岩、丘复等大家名家。与此同时,客寓作者如周景辰、吴文度、徐中行、赵良生、王廷抡、丁淮、熊为霖等,也创作了许多描写客家山水名胜和反映客家社会生活的诗篇。

由此可见,客家文学的作者群不单有客籍作者,也有许多客寓作者。客家文学的建设从来不只是客籍作者的孤军奋战,事实上,客寓作者一直是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领导、推动)了客家文学的建设,才使客家地区的文学出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因此,在界定客家文学的作者群时,外延应当从宽一些。倘若以籍贯为唯一标准,把客家文学的作者限定在“客家人”,其结果必然是大大萎缩了客家文学的丰富性与包融性。

罗可群先生所著《广东客家文学史》一书中,著录了唐宋客籍作者12人,客寓作者(入粤文学家)5人;明代客籍作者12人,客寓作者2人;清初至清中叶客籍作者15人;近代客籍作者66人,其中“客家才女”7人。钟俊昆先生所著《客家文学史纲》一书第二编,在叙述赣南客家文学时也充分肯定了客籍作者与客寓作者共同对客家地区文学发展的作用。不足之处,就是在阐述福建和广东客家文学史纲时均无客寓作者的出现。

(二)从题材来看,描绘客家人的生活环境,反映客家人的劳动生活及其思想情感,是客家文学的主要内涵。

首先,客家文学大量描写山川景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数量上山水诗也占很大比重。闽西客家文学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汀江流域发展起来的,这里的生活空间不同于滨海(湖)地区,也不同于内陆平原、雪域高原,它全部是丘陵山地和小块盆地,竹树茂密,河水丰沛,是一块山青水秀之地。在客籍作者眼里,这里是祖祖辈辈筚路蓝缕开垦出来的美丽家园;在客寓作家眼中,这里的蛮荒之地,有别于通都大邑的喧嚣与繁华,他们于此获得的是一份忘怀名利的宁静和未经雕饰的素朴之美。仕宦客家地区的官员和流寓的诗人大多是被贬谪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之士,当他们遨游客家山水时,不但鉴赏风物的奇特,还会产生客至如归、此乡是吾乡的感

觉。南宋临汀郡守陈晔(福建长乐人)就曾赋诗说:“我爱汀州好,山川秀所钟。阁前横潏水,亭畔列奇峰。古驿森慈竹,莲城挺义松。”^[1]客家人文地理的独特之美与诗人审美眼光的结合,是客家山水诗之所以丰盛的原因。这些山水诗对汀州客家地区的文学发展是有贡献的,这些山水名胜因诗歌点缀而熠熠生辉,中国山水诗本身也因而有了许多过去很少表现的景物在这里得到非常成功的刻画,正如我们从《楚辞》中发现了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山川风物而时时为之惊奇不已。

我们知道,客家文学首先是地域文学、族群文学。客家文学的地域性,是客家人聚居地区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具有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三个特征。古远清先生在《客家文学界说》中就曾指出,客家文学是“在中国客家族群生活的土地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学。”^[2]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文化的产生,与客家地域的特点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那么反映客家族群社会生活的文学必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个问题在罗克群先生的《广东客家文学史》、钟俊昆先生的《客家文学史纲》二书中已有全面而细致的阐述^[3]。

其次,客家文学反映客家人的社会历史、劳动生活,展现客家人的民俗风情,抒写客家人的心灵的喜怒哀乐,记载客家人不懈的理想追求,同时也有客寓作家抒写他们在客家地区的见闻与感受,具有客家地区独特的人文内容。客家人是中原汉人与土著闽越族人和畲族人融合发展而来,产生出独特的客家文化,包括宗教、民间信仰、客家方言、宗族观念、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尤其是客家文化中最为闪光的客家精神,包括迎难拓业、崇文重教、和睦亲邻、思根报祖等等,都在客家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这是客家文学中最为重要的内涵,也是异于其他民系文学的人文特征所在。

客家文学既是地域文学,又是特色文学。有论者强调“客家的”“文学的”是客家文学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因素^[4]。“客家的”应当包括客家地域、客家人、客家人文特征三方面的内涵。三者表现在文学之中,“地域”是稳定的条件,“客家人”是灵动的因素,“客家人文特征”则是本质的要素。显然,客家文学的特色,其实就是客家人文的特色。

[1]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132,中华书局影印本 3799 页,原诗缺两句。

[2] 古远清:《“客家文学”界说》,《客家研究辑刊》,1994 年第二期。

[3] 见罗可群《广东客家文学史》第 24 页,第二章第二节“山乡特色”。钟俊昆《客家文学史纲》,第 20 页,第三章“地域文学史的写作构想”。

[4] 黄恒秋:《客家文学的省思》,载《客家台湾文学论》,台湾苗栗县立文化中心,1993 版。